

《历史研究》 五十年论文选

(冷战史)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

(冷战史)

《历史研究》编辑部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冷战史）

编 者 / 《历史研究》编辑部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张晓莉

责任校对 / 段 青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6.5

字 数 / 421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536-9/K·125

定 价 / 43.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丛书得到香港金城营造王锦辉
慈善教育基金会资助，谨此致谢！

序 言

章百家

冷战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至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才告结束。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不仅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演进，也深刻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本论文集收录了 1999 年至 2003 年期间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 18 篇论文，它们是中国学者在冷战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冷战”这种源于西方的对战后现实世界的描述，只是在凝结成历史范畴之后才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对冷战问题的研究也以其终结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作为战后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冷战从其起源时起就受到美国及西方一些研究者的关注。很长时间，这项研究可以说是他们的专利。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主要是东方国家的学者在研究战后国际关系时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冷战问题，但基本是将其视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东方社会主义各国实行“遏制”政策的一种行为。

直至 80 年代，中国人还很少使用“冷战”这个词汇；但以回顾的眼光来看，我们却无法否认冷战与中国的纠葛：一方面，美苏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冷战是围绕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展开的，冷

战不仅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也使得中国周边地区长期成为“冷战”中热度最高的地区，出现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冷战时代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另一方面，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又反作用于冷战的进程，不断改变着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中国因素在冷战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绝非无足轻重，其间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

最近十几年，冷战史研究已成为中外历史学界的热门课题。促成“冷战热”出现的直接原因有三个：一是冷战已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二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特别是俄国和东欧各国大量档案的解密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三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为学者们互通信息、共享史料、交流学术成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现在，冷战史研究不仅吸引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参与，还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跨国分工与合作，中国学者也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不可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本集子收录的论文大体可分为三组：一是关于冷战史研究的状况及其面临的一些理论问题，二是对冷战初期一些重大事件的考察，三是冷战背景下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这些论文相当典型地反映出近年冷战史研究的几个主要特点：第一，研究者力图从后冷战的历史高度重新考察和审视冷战的过程，其重点不仅在于对史实的重新考订，更重要的是开拓新的视角和更新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第二，注重案例研究，以此加深了对历史进程中一些关键环节的了解；第三，强调历史过程中复杂的互动关系，而不再满足对某个过程的一般性描述；最后，所有的论文都大量使用了新史料。

上述这些特点表明，冷战史正在成为一个多视角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如果将冷战史研究的前后两个阶段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以往的冷战史只是战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专题，而现在

冷战史研究的触角已伸延到战后世界史的各个方面，无论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还是地区和国别。冷战史既可兼收并蓄，又可为我们研究和理解战后世界的演变提供一条比较清晰完整的线索，这便是它独特的诱人之处。

2004 年 11 月

目 录

“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

.....	陈 兼 余伟民 / 1
冷战起源刍议	霜 木 / 38
英国与冷战的起源	李世安 / 53
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	叶 江 / 74
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与苏联势力范围的确立	张盛发 / 94
1948 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	沈志华 / 121
美国《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1951）》的形成及其 影响	崔 丕 / 154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	崔 丕 / 178
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 1953 年	时殷弘 / 204
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杨奎松 / 218
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沈志华 / 254
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	杨奎松 / 285
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	张小明 / 317

2 《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冷战史）

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牛 军 / 338
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	牛 军 / 367
“蒙古问题”与冷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刘晓原 / 401
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	戴超武 / 434
新疆苏联侨民问题的历史考察（1945～1965）	李丹慧 / 476
编后记	/ 515

“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 特征及其批判

陈 兼 余伟民

冷战史研究，是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在一些新成立的国际学术机构（如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①）的推动下，各国学者以冷战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大量涌现。同冷战尚未结束时的情况相比较，这些新成果在充分利用西方国家有关档案资料的同时，也抓住了前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档案解密及中国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资料开放的历史机遇，在研究方法、范畴、视角以及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均有很大突破，从而产生了被美国著名学者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的学术新潮流，在很大程度上

① 这些机构的英语名分别为：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t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WIHP)，Harvard Program on Cold War Studies，Cold War Studies Group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GWCW)，Cold War Studies Program a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The 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

更新了人们对于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乃至整个 20 世纪世界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认识^①。本文的主旨，即在于对目前仍在发展之中的这一学术现象提出批判性的评述，并就其对冷战史研究在中国进一步开展的涵义进行讨论，以就教于同行与读者。

一 冷战史“旧研究”：阐释与批判

要了解“冷战史新研究”的渊源，有必要从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历史的“旧”研究谈起，并对之作一些简要的阐释与批判。

上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冷战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正统派”（The “Orthodox School”）或“传统派”（“Traditional School”）学者。他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对其性质又应当如何认识？在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时，美国学者往往将苏联视为“邪恶强权国家”，认为其对外政策及世界战略的基本目标不仅在于摧毁整个“自由世界”的体制与价值，更同沙俄帝国的扩张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在于建立苏联自身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霸权^②。

① 关于盖迪斯就“冷战史新研究”所作论述，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81~295; 关于由盖迪斯看法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的争议，参见 Richard N. Lebow, *We Still Do Not Know!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2, no. 4, 1998, pp. 627~632; Melvyn P.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Kno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 no. 2 (April 1999), pp. 501~524.

② 关于“正统派”可参见 Arthur Schlesinger Jr.,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46, 1967, pp. 22~52; Jerald A. Comb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220~234; Geir Lundestad, *Moralism, Presentism, Exceptionalism, Provincialism, and Other Extravagances in American Writings on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3, no. 4 (Fall 1989), pp. 527~546; 亦参见尹良武《冷战史学管窥》，载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47~355 页。

与这一大背景相关联，“失去中国论”（The “Lost China” Thesis）在美国对华政策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一些学者同右翼保守派政客遥相呼应，把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杜鲁门政府未能站在国民党政权一边对中国局势进行干预^①。这种看法，不仅是“美国中心”心态的典型暴露，也为美国政府推行对华军事对抗、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的全面敌对政策提供了重要注脚。

进入50年代中后期，随着麦卡锡主义的退潮以及冷战本身越来越成为战后国际关系演变中的“常态”，一些早期“正统派”学者的看法朝着非政治化方向逐步转变，再加上当时以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如日中天^②，这就促使“正统派”学者在方法论的层面向“现实主义”靠拢。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出现的“正统派”论著的主要特点是：对国际政治斗争的分析，一般以纯粹物质意义上的“权力”（power）界定为出发点，而往往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一概念本应包含的思想、意识与观念层面（亦即“软权力”层面）的内容；而冷战对峙双方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行为，则被视为仅仅是替既成事实的决策所作的辩解，而非导致决策产生的原因^③。

① 关于“失去中国论”的典型例子，参见 Anthony Kube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Chicago: Regnery, 1963。

② 关于汉斯·摩根索在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巨大影响，参见 Martin Hollis and Steve Smith,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2~28。

③ 参见 Paul Y. Hammond, *The Cold War Year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9; Herbert Feis, *From Trust to Terror: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New York: W.W. Norton, 1970; Adam 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73*. New York: Praeger, 1974。

进入 60 年代以后，美国卷入越战并触发对外政策危机和国内政治与社会动荡，西方学术界也因此发生内在分化，“正统派”开始受到了新崛起的“修正派”的挑战。早期修正派学者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判为出发点，对于当时统治西方学术界的种种关于冷战起源及进程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并将冷战发生的责任归之于美国方面。到 60 年代后期，新锐学者将对冷战历史的思考同知识界因越战经验而引起的深刻反省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指出：美国进入并推行冷战的基本原因，在于将自己的意愿及对于自身利益的解释以强权手段加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在冷战中所推行的，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帝国扩张政策，是为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直接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与市场服务的^①。

然而，“修正派”从一开始便存在着种种明显的缺陷。首先，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同时，修正派学者的论著（尤其是早期修正派论著）多系滔滔雄辩，对史料的掌握与使用不够精细^②。其次，虽然修正派对正统派关于冷战起源与进程的解释提出了挑战，但在方法论的层面，却同样受到了当时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研究

① 关于“修正派”的一般性概述，可参见 Comb,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pp.235 ~ 257; Bradford Perkin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Twenty-five Years Afte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10 (December 1982), pp.318 ~ 330; Anders Stephanso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Reynolds (e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30 ~ 35; 典型的修正派著作包括 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3 ~ 1945*.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Joyce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 ~ 1954*.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8; Thomas G. Paterson, *Meeting the Communist Threat: Truman to Reag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90.

② 尽管一些修正派学者激进的批判态度后来发生了变化，并越来越注意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但从总体上来看，以上基本特点并没有发生变化。

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制约。大多数修正派学者往往强调，美国政策行为中的“反共”意识形态色彩，其实只是对根本政治及经济利益追求的一种掩饰或辩解。换言之，同正统派一样，在大多数修正派学者的眼里，冷战的实质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思想观念和制度之争。再次，修正派学者陷入了方法论上的又一误区：就提出与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来看，修正派学者的思路与正统派一样，为“美国中心论”所左右。他们的研究，大都以美国政策为主要对象；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美国方面的有关文献；其历史批判的目的，则在于追求美国对外政策及与之相关的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他们的信念是，如果美国的政策能够向着好的方面转变，那么，冷战的整个进程也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生变化。

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中美关系研究中“失去机会”论（The “Lost Chance” Thesis）的出现及由此而引起的学术论争。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美国逐步从越战中脱身和中美关系缓和，曾经在美国学术界中美关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失去中国”论也受到了尖锐质疑。一些学者提出：如果杜鲁门政府在中国内战中不是一味推行支持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那么，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本应存在着实现合作、至少是避免对抗的种种机会；正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坚持推行敌视中国革命的政策，才使得美国未能抓住与中共接触与合作的机会，并进而导致了中美两国的全面对抗^①。从表面上看，“失去机会”论似乎对美国对华政策持尖锐批判的态度。

^① 论及美国在中国“失去机会”的著述主要有 Warren I. Coh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34 ~ 1945*. Orbis, 11 (Summer 1967), pp. 551 ~ 569; Joseph W. Esherick (ed.), *Lost Chance in China: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 1974; Warren I. Cohen, Acheson, His Advisors and China, 1949 ~ 1950. In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1947 ~ 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3 ~ 52;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 ~ 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但“修正派”学者在并没有对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便断言，如果美国施行另一套对华政策，便能够改变中国革命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在内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并由此改变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这显然有失公允。由此看来，“失去机会”论同“失去中国”论一样，在方法论上仍然受到了“美国中心”意识的主导^①。

进入70年代以后，冷战史研究的大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首先，冷战初期的有关档案资料在美国等国开始解密，从而为学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了解冷战期间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决策机制、设想以及进程的机会^②。与此同时，美苏两大国之间“缓和”体制的逐步建立，又抽去了国际关系中冲突性因素的紧迫性。随着国际政治对抗中“常规化”趋势的出现，冷战中意识形态对峙的因素也进一步淡化^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修正派”（Post - Revisionist School）开始崛起，在充分利用美国及西方国家解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后修正派”学者将自己的学术努力首先放在重建“历史事实”上，并进而指出，冷战的起因，主要在于美苏双方对于

① 毫不奇怪，进入90年代后，“失去机会”论在国际学术界遇到了尖锐挑战。关于这方面的论辩，参见 Warren Cohen, Chen Jian, Odd Arne Westad, John Carver and Michael M. Sheng, A Symposium on the Lost Chance Debate in China.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1, no. 1 (Winter 1996/1997), pp. 71~115。

② 这里必须指出，70年代初美国档案解密的实际进程，同“修正派”学者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美国卷入越战）的严厉批判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应对修正派学者所提出的种种挑战，美国政府加快了档案开放的进度，并扩大了档案开放的规模。

③ 这里所涉及的，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全球范围内的冷战是否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转型”、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发生了转型的问题。2001年6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冷战转型及中美苏战略关系的演变”专题学术讨论会，着重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关于会议有关讨论的概况，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印《冷战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1期。

对方对外政策目标的误解。而在冷战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双方的误解又由于国际局势的极端两极对立以及各自来自国内的压力而不断加深，并进一步导致了双方的过度反应。同“正统派”及“修正派”分别将冷战兴起的责任归之于苏美两国的做法不同，大多数“后修正派”学者所强调的是，美苏两大国对冷战的发生都负有责任；冷战的发展，则是双方政策在国际政治发展的实际运作中交互影响的结果^①。

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史的研究，主要由以上各个学派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所主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学派对于冷战起源及进程的阐述和解释存在着各种分歧，但在方法论这一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却有着共同点，并因而揭示了冷战史“旧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特点。

首先，从研究的范畴与手段来看，他们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几乎完全以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资料为依据，实际上往往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美苏两大国关系研究的一部分，至多也只能说是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种延伸。事实上，我们上面所列举的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就他们所属学科的定位而言，都是“美国外交史”，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关系史。其次，从研究的视角来说，几乎所有著作都表现出了一种

^① 关于“后修正派”的一般性概述，可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7, no. 3 (Summer 1983), pp. 171 ~ 190。盖迪斯最主要的代表作为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莱夫勒最主要的代表作为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伦德斯泰德最主要的代表作为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Other Studies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斯塔克的主要代表作为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 ~ 1950*.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Press of North Carolina. 1981。

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从课题设计，到问题的提出，到资料的搜集及使用，再到论述的展开及结论的获取，研究者的关注重心始终是美国。至于冷战中的其他国际关系行为者——甚至包括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只不过是因其成为美国政策的对象和目标才获得学者们的关注。学术研究的这种单边性，不可避免会造成学术解释上的片面性。再次，从研究方法论来看，受到了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念及传统”的深刻影响。由于对“权力”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及历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作出了纯粹物质性质的定义，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国际对抗中的“制度性因素”受到了学者们的忽视。在各学派的大多数学者看来，冷战时期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所作出的肤浅的承诺”^①。最后，从研究的范畴及个案选择来看，几乎完全集中于高层政治和重大危机处理，而对同冷战国际关系史发生、发展显然有着密切关系的许多相关问题，如冷战期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变化，文化因素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的关系，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演变，等等，则几乎都被排除在冷战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上述种种因素的结合，造成了冷战史“旧研究”的局限性。

① 在这一大背景下，在有关中国与冷战关系的研究中，一种强调“中国面临威胁”（China under Threat）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了国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受到这种观点影响的学者一般认为，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搞清中国领导人“基于国家安全而产生的种种考虑”。就构成这些考虑的核心因素而言，中国决策者同其他国家决策者并无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无非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安全，经济发展，以及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等等。参见 Melvin Gurtov and Byong - 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又参见 Nakajima Mineo, Thomas Robinson, and Jonathan Pollack 等学者在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vols. 14 and 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and 1991) 中所著的章节。